

藏

族

文

学

史

藏族文学史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 编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成都

责任编辑：周介生 罗润苍

封面设计：蒋光年

技术设计：张绍普

藏·族·文·学·史 (平装本)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22 5 插页4 字数480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书号：M 11140·46 定价：4.64元

前 言

藏族自古以来生活在平均海拔四千公尺的青藏高原上。据1982年调查，藏族共有三百八十七万多人。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创业的智慧、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开拓、建设和保卫了祖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光荣成员之一。

一千三百年前，藏族著名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开始创制了藏文，陆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写下了大量历史、科技、文化、宗教、天文历算、医药卫生等著作，形成了中外闻名的藏族文化宝库。

藏族文学，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汗牛充栋的藏族作家文学名著，还是浩如烟海的藏族民间文学名篇，都是我国文坛上独具藏族风情和高原色彩的文学之花，也是世界文坛的一支奇葩。

藏族文学在文化上有重要地位，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社会作用。随着藏族作者队伍的壮大和创作热情的日益高涨、藏族文学的研究工作日益开展、藏族文学的读者队伍日益扩大、藏族文学的社会影响日益深远，

编写一部《藏族文学史》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这是建立藏族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础，是藏族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从事民族工作的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1958年，我们接受了编写《藏族文学史》的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今天，这部《藏族文学史》（建国前的部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毕竟是编写组的同志们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我们还是大胆地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求得教正，以期不断完善。

下面就编写中遇到的若干具体问题，谈谈我们的处理原则和办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第一，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考察了藏族社会和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藏族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同祖国其他民族有显著的不同；加之藏族有通行的藏文，在文学创作中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方法，都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文学上的这种特点和风格也不断发展变化。这是划分藏族文学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同时，藏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自古以来就与祖国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广泛的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这在文学上不能不反映出来。在确定藏族文学史的分期时，这些情况也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把藏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建国前的部分）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文学史也相应地分为四编。各编均按时序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编：远古和奴隶制时期的藏族文学。藏族史上的远古，主要是指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漫长岁月，那时的青藏高原处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各地居住着互不统属的许多部族，当然更没有统一使用的文字。当时的文学，全是口头创作口头相传的民间文学，根据历史文献来看，估计作品是很多的，可惜大部失传，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几篇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藏族最早的文学，反映了藏族先祖对世界形成和人类起源的天真想法和开发高原的艰苦历程，也透露了他们的一些美丽幻想。这些作品有的被后人用文字加以记录，有的一直在口头流传，是弥足珍贵之作。

吐蕃王朝是藏族第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虽然传说从聂赤赞普等天赤七王到纳日松赞有三十二代赞普，长达一千年之久。但是真正把青藏高原诸部族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藏族和强有力的地方性政权，还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完成的历史大业。所以，我们叙述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也主要是从松赞干布当权到朗达玛被杀的二百多年时间。这一段，由于藏文的创立和逐步完善，出现了藏文著作和汉文、梵文典籍的藏译，可以说是藏族作家文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叫做藏族作家文学的童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敦煌石窟的藏文文献、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简和一部分吐蕃时期的钟铭碑文，确实是最古的藏族书面作品之外，尤为可贵的是还有《巴协》一书。这些吐蕃文献，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藏族和邻邦尼泊尔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值得后人永远赞

美；二是忠实地把当时流传的民歌、民间神话、历史传说、民间谚语、卜辞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了藏族早期文学作品原貌，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三是文字朴实、精练、准确，奠定了较好的文风。这一切，应该说是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二编：封建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起自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止于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延续四百余年。这一历史阶段，整个藏族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握有较大实力的旧奴隶主和新封建主各霸一方，形成勾心斗角、互相攻伐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早已传入藏族地区的佛教，也先后形成噶当、宁玛、萨迦、噶举等不同教派和许多小的支系。这一历史阶段，人民厌恶分裂，渴望统一；厌恶战乱，渴望安定；厌恶颠沛流离，渴望休养生息。而各个政治集团和各个教派则极力设法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群众影响。这一时期的藏族作家文学，主要是为著名人物树碑立传，宣传本教派的教义和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想以佛法统一人们的言行。因而，当时学者思想相当活跃，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一些大部头有影响的传世之作相继写成，把作家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以反映吐蕃王朝社会历史文化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伏藏”的披露，以宏扬佛法为主旨的《米拉日巴道歌》的传播，以歌颂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为主线的《格萨尔王传》的诞生，以宣传治学、从政、待人接物的规范为目标的《萨迦格言》的发表，以及大量佛教经典的藏译，就是这一历史阶段藏族文学大发展的主要标志。

第三编：封建农奴制社会前期的藏族文学。起自公元十

三世纪六十年代，止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也是将近四百年。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元、明两个封建王朝中央政权对藏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又有了一个相对有权威的藏族地方政权，即藏族历史上的萨迦、帕竹、噶玛巴三个教派头面人物主持的三个地方政权。这一历史阶段，藏族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建立并强化起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因而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藏族文学有了进一步繁荣的客观条件。例如，藏文经过几次厘定，正字法和文法更臻完备，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木版印刷技术传入藏族地区，开始建立了印刷机构，为学者著作和出版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这一时期，藏族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和戏剧文学的繁荣，标志着藏族文学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第四编：封建农奴制社会后期的藏族文学。起于公元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止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延续三百年左右。这个时期，藏族的封建农奴制逐渐走向下坡路，三大领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噶丹颇章执掌了西藏地方政权，藏族地区的统一进一步加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限进一步集中，直接过问藏区的重大事务，打退了外国侵略者多次入侵，平定了西藏内部几次大的动乱，在一些重大政治、人事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以稳定藏族社会。因而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学也有了新的变化，许多作家注意从藏族社会现实生活中摄取重大题材，尤其是民间文学领域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政治倾向更为鲜明，文学的战

斗性大大加强了。民间文学的滚滚洪流，也给作家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在一些作家诗歌、寓言小说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仓洋嘉措情歌》和《猴鸟故事》是两部代表作。这一时期，藏族作家文学逐渐与历史、哲学、宗教分开，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旋努达美》与《郑宛达瓦》就是可贵的尝试。许多优秀之作，文学味道浓郁，文学特点突出，写作技巧精湛，与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这一历史阶段后期的藏族文学，直接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开火，为自由光明而歌，闪耀着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火花。抗英民歌和格达活佛怀念和赞美红军的诗篇，就是杰出的作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藏族的传统文学真实地反映了藏族人民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农奴社会的奋战历程、思想境界和生活图景。

第二，关于藏族民间文学和藏族作家文学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价值，它们是藏族文学飞翔的两个翅膀，彼此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藏族民间文学中，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文学之冠。此外，还有大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神话传说、长诗长歌、寓言、折噶唱词、婚礼赞词，等等。它的创作历史比作家文学更为长久，它的体裁形式比作家文学更为丰富，它的思想内容比作家文学更为广泛深邃，它的语言艺术比作家文学更为生动风趣。总之，它是藏族劳

动人民的创造，反映了藏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观点，代表着藏族劳动人民的爱憎立场和是非标准，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过去在剥削阶级当权的年代，藏族劳动人民没有政治地位，他们创作的口头文学，也受到歧视和排挤，不能登大雅之堂，绝大部分作品没有文字记载，有的作品甚至被禁止流传。今天，让这些藏族劳动人民佳作与藏族作家名著一样，一起写进《藏族文学史》，充分肯定它在藏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

藏族作家文学，其创作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丰富，民族风格之鲜明，运用语言之功力，写作技巧之熟练，足以给我民族文学宝库增辉。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藏族学者在丰富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上的贡献。这里，必须指出：著名的藏族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很注意吸收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和闪光的思想的。例如，《米拉日巴道歌》，就是在鲁体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米拉日巴传》的一些动人情节，也多是采用了民间流传的生动故事；历史名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的精采章节，诸如猕猴繁衍人类的记载，有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描述及大昭寺的修建，都是民间传说的艺术加工；《仓洋嘉措情歌》之所以蜚声文坛，受到中外读者的热烈欢迎，是同采用谐体民歌形式、吸收民歌内容密切相关的。但是，作家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方面有更深入的开掘，更完整的故事情节，更细致的艺术构思等等，那是民间文学难以替代的。勿庸讳言，某些作家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结构形式，都带有一定的历史印记。对此，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去评价，找出其成功的经验和社会价值，指出其缺点和局限性，以便于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作为发展当代藏族社会主义新文学的一个借鉴。

第三，关于文史哲不分的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藏族学者没有今天科学定义上的文学这个概念，因而也很少创作纯粹文学性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历史、哲学、文学兼而有之。最典型的有记述王统世系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记述名人一生事迹的传记著作，宣传佛学要旨的宗教著作。就是道歌著作和格言著作，也都非常强调哲理性。上述这些著作，在记人叙事论理的同时，特别注意文采，有很高的语言艺术和写作技巧，描写颇为生动感人，富有文学情趣。因此，说这些著作主要是学术性著作，同时也可以算作文学著作，把它列入文学之林，是合乎藏族文学实际情况、是大家公认的。在文学史上加以叙述，并非改变其学术著作的性质，而是又赋予它以文学著作的荣誉。

本书中提到的敦煌文献中的吐蕃赞普的传略，历史著作《巴协》、《玛尼全集》、《五部遗教》、《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传记著作《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日琼巴传》、《汤东结布传》、《颇罗鼐传》，格言哲理诗著作《萨迦格言》、《甘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等，都取其某一特点作为文学作品而加以介绍。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超过这些文史哲合璧的文学专著出现。这些名著正好为藏族文学史填补了作家文学的空白，这应该说是藏族人民的骄傲。我们有理由称萨班·贡噶坚赞、桑吉坚赞、索南坚赞、索南扎巴、阿旺·洛桑嘉措、

巴俄·祖拉陈哇、贡唐·丹白准美、米庞嘉错等藏族学者是藏族文学家。他们的著作显露出来的文学才华，把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带进了文学的史册。

把文史哲合璧的名著写进文学史，应该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内容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相当优美的文学笔调，群众公认是当时著作中最富于文采的著作，这是一个大前提。其次，在同一时期没有或者很少纯粹文学性著作的情况下，群众把这些著作既当做历史专著来研究，又当做文学读物来欣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有些历史、哲学、宗教著作，把大量谚语、民间故事写进书中，作为说明问题的例证，或者在叙述时写有一些琅琅上口的诗歌，这是藏族著作常见的散韵结合体，往往给人一种生动活泼之感。这就是说，有些文史哲合璧之书，如果不具备上述某一个条件，则不能列入文学之林。

公元十七、十八世纪以后，藏族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作家文学的主流，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地把文史哲分开了。因此，后期藏族学者的历史、哲学著作，除了特别富有文采的传记仍作为文学作品予以介绍外，就不在本书中介绍了。

第四，关于宗教和藏族文学的关系问题。宗教在藏族历史和藏族社会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宗教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同样，宗教同藏族文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故事情节等，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特点，是评论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必须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是非标准，必须从藏族社会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和加以恰当的阐述。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藏族的祖先就信仰多神的苯波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藏族地区，开始曾同苯波教有过矛盾和冲突，后来吸收了苯波教的一些东西，很快适应了藏族上层人物和统治集团的需要，扩大了社会势力，成为藏族大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左右着藏族大多数人的言论行动。那么，作为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就不只是打上一些宗教烙印而已，而是在作品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涂上了厚厚的宗教色彩，甚至有些作品就是直接宣传宗教的。在宗教占支配地位的藏族社会，没有宗教影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宗教与藏族文学之间究竟有哪些关系。

从作者来说，许多人本身就是笃信佛教、对佛学有很深造诣的宗教理论家。例如，以编唱道歌著名的米拉日巴，撰写格言诗著名的萨班·贡噶坚赞、索南扎巴、贡唐·丹白准美、米庞嘉措，撰写历史文学名著的巴·赛囊、索南坚赞、巴俄·祖拉陈哇、阿旺洛桑嘉措，撰写诗歌著名的仓洋嘉措、擦珠·阿旺洛桑，撰写传记文学著名的桑吉坚赞，撰写长篇小说著名的达普巴·洛桑丹白坚赞，基本上都是名贯全藏的高僧。他们既然是宗教界名流，所写作品，自然也就倾注很多心力来宣传佛法。当然，也有个别僧人作家写了一些纯属世

俗生活的作品。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并认真研究这一些特殊历史情况和文学现象。

从佛教典籍和藏族文学的渊源看，不仅许多文学作品取材于佛经故事，而且有些佛经内容本身就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被译成藏文之后，藏族人民很自然地把它与藏族文学作品等同看待。前者如藏剧《赤美滚登》、《洛桑王子》，都是根据佛经故事改编而成；后者如《贤愚因缘经》、《佛本生故事》等，本来是梵文佛经，后来也成为藏族人民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了。而《萨迦格言注释》、《甘丹格言注释》和《众生养育滴注释》中的一连串故事，大部分也采自佛教典籍，不过有所删节罢了。

从藏族文学的创作思想看，更是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有些作品在写到难以忍受的人间苦难时，往往是把不幸归之于“前世之业”，把希望寄托于“来世”，采取忍让态度；或者是把受难者幻化成仙，飘然升入天空而去。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显然是受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知，藏族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宗教色彩，是有一定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藏族文学作品时，应着重研究该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些作品确实有明显的宣扬天命观、宿命论思想，起着麻醉人民的作用的一面；但是，要看到大部分藏族作家都是与世俗社会有联系的，他们对社会生活作了相当全面的观察，他们的有些作品对社会事物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同情人民大众疾苦的一面，总结了一些比较好的有用的经验教训，讲了一

些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道理，是对读者有一定启迪作用的。我们只要采取正确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做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判断。

藏族民间文学与藏族作家文学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不尽相同，虽然也有些作品掺杂着相当明显的宗教思想内容，有意无意地宣扬了神权至上的世界观，但确实有一部分作品冲破了宗教清规戒律的思想牢笼，大胆地喊出了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声音。这类民间文学与佛教经典唱的是截然不同的调子，反映了藏族社会上存在着无神论和有神论两种思想的矛盾，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矛盾，存在着不信教和信教两种势力的矛盾，尽管这些矛盾只是在某些角落秘密地露出端倪，但却表现了藏族民间文学敢于向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决裂的勇气。

第五，关于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问题。藏族有文字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出现过几次高潮，产生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著作家。一般说来，藏族著作家都是精于五明之学的学者，在藏族文化各方面都有比较雄厚的功底，大部分人著书立说的内容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人文地理、雕塑绘画、宗教、民族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每个学者都有一两个方面的特长，他们的著述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都应当受到尊重。不过在藏族文学史上，只能把那些在文学上有贡献的学者和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理论著作，加以评述。

此外，既然是藏族文学史，当然应该把藏族的一切代表性

作家、一切代表性作品写进去。所谓代表性，有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首先是那些在藏族文学中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这自然是众望所归、没有什么异议的。另一方面，要照顾全面，适当考虑其某种特殊性。例如，在某一个文学品种，在某一种思想内容，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在某一个地区，在某一种体裁形式，在某一个文学流派，在某一种文学风格等小范围的作家和作品，也是一种代表性。即使水平稍差些，也要承认它是某一方面的藏族文学之花，也应该在文学史上有所反映。这样做，既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也可以较客观地反映出藏族文学的丰富多彩。

本书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根据藏族文化界和广大藏族人民的公论，介绍和评价了一定数目的藏族作家和作品，但远远不是藏族作家和作品的全部，只能说把藏族文学从纵横两个系统勾画出了一个大致轮廓。根据一些藏族学者提供的线索，还有不少重要的藏族作家和不少重要的藏族文学作品。要把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的藏族作家和作品都写出来，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许多人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较好地完成。今天已经有了开展这件工作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同所有藏族文学研究者团结协作，力争把这件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藏族作家的贡献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藏族文学作品的成就达到的高度不同，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不同，因而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应实事求是，恰当地确定每个作家每篇作品的地位，给读者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我们虽然反复研

究、反复比较，写出了初步结论，但是限于认识水平，加之未能全面掌握情况，还可能带有片面性，肯定有不妥之处，这个问题还请大家进一步探索和评定。

第六，关于藏族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问题。自古以来，藏族就同国内一些兄弟民族和国外一些邻邦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藏族文学领域产生了有重要价值的作品。这是藏族人民同国内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共同前进的象征，这是藏族人民同邻国人民友好往来、发展友谊的象征。

藏族学者和藏族青年，一向有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传统，同时又有使之扎根藏族土壤很快藏族化的创造力。例如，吐蕃时期藏族天才的语言学家吞米桑布扎，考察了古印度的几种文字，以此为借鉴，结合藏语特点，很快创立了藏文；不久，就有一批藏族学者同汉族学者合作，用藏文翻译了一些汉文典籍；同印度和汉族学者合作，又翻译了大量梵文和汉文的佛教经典和多种著述。其译文之准确、通顺，令人叹服。十三世纪的藏族大学者萨班·贡噶坚赞，看到古印度盛行格言诗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从而受到启发，便精心研究龙树等人的格言诗，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萨迦格言》，开创了藏族格言诗的先河。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著述被译成藏文，翻译、借鉴、吸收别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藏族历史上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就大大开阔了藏族人民的视野，丰富了藏族的文化宝库。

另一方面，藏族的一些文学名著逐渐变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例如，《格萨尔王传》、